

义的国家文化精英在这个过程中行为，并把社会学界内部的共识文化（文化程度，教育水平）作为研究的因素、变量之一。

自 80 年代末以来，文化研究逐步淡化了其“启蒙”的使命，不再居高临下，而是承认各种群体有其特有的文化，并帮助这些群体向社会表述其文化，促使其文化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承认。

研究者要把自己定位于表述，要求自己深入其中，以同情与理解的态度参与观察，首要的使命是澄清这种文化现象是怎么回事，然后把它说清楚，让社会也能够理解它，最后达成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共处。

要注意文化与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与文化多元这些社会现象：官方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这里存在着社会学者的差异以及关怀的差异：如何帮助表达、帮助沟通、帮助获得承认。在多种生活方式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问题与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意味着从代表全体到代表自己。

对民间文化复兴的研究，从批判到理解。

大众文化研究，批判到辩护。

对同一对象的学术关怀的差异更能够说明从启蒙到表术的嬗变。例如有关传统研究，清除传统的现代化。以传统为基本的现代化（发展，进步）。

## 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周 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教授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这二十年，同时也是中国人类不断成长的二十年。中国人类学成长的路径大体上有以下几条线索：

1. 由“民族研究”中逐渐复活并不断发展的“民族学”，大体上以中国民族学会及其活动为象征。2、伴随着中国人类学会的成立和以几个高校人类学系的建设为标志，包括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在内的人类学学科体系得到强调。3、中国社会学史上存在的那个主要的“社会人类学”的传统，在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再次引起部分学者重视，同时在新的学术实践活动中，该传统也有一定的新的积累。4、涉及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旧著重刊工作、新近的人类学理论著术的译介工作等，促成了人类学界知识的新旧混杂状况。5、留学国外或有海外进修经历的中青年人类学者，带进来了一些新的前沿理论和理念。6、社会—人文科学的其他诸多领域对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知识的渴求及试用，即人类学知识在整个知识界一定程度的普及，也应是中国人人类学逐渐成长的重要侧面。当然，还可列举很多，例如专业教育的成长（民族学专业和人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点等）；再如于“中国民俗学”的知识传统中事实上存在的与人类学的学术性关联，它所积累的成绩及其潜力等。

在这些不同路径之间，虽然存在着彼此间的影响和互动，在一定的情形或场景下，不同路径的跋涉者也可能互认为“同行”，但多数场合下都是在各自的知识传统或“学科”中有意无意地建构各自感到惬意的学术空间和话语体系。我认为比起学科来，把此种状况理解为不同的学术“知识传统”的并存似乎更为恰当。那么，我们是否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不断地



努力使不同的“学科”或知识传统之间的共识、共享部分逐渐增长？有没有必要及可能融通各个涉及人类学的不同“学科”领域或知识传统，以促成共享的人类学体系或成就一个“人类学界”？抑或继续坐视或促使它们在不同的轨迹上日益“特化”（或“专业化”？）在我看来，社会学与人类学这类主要是（至少在其初始阶段）舶来的知识，在它们的产地原本就属于不尽相同的传统，传入中国后应该在研究中国社会及文化问题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变通和成长为我们新的知识。在涉及或与“中国人类学”相关联的不同传统的知识体系之间，尤其需要的是相互欣赏和相互倾听，而不是不断建构新的壁垒。可以预见的是，这些不同的知识传统将会长期沿袭，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人类学在中国逐渐成长的一种实际状态。

来自中国社会与文化田野实践基础和学院（和学派）式的学科建构，依然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成长的两个互动的重要方面。这是我们缅怀早期中国社会学史上那个人类学传统时也同样能深切体会到的。即便有机构、专家或在学术传承的某个系统里，人们可能致力于建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纯洁性”但面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研究中如此复杂多样、林林总总和层出不穷的实践课题、中国社会学中那个人类传统的存续和发展，依然可能是有重要的甚或难以替代的建设性的。

## 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

赵旭东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讲师

最近看到一本新书是讲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在战后的发展，书的编者将这一发展称之为第二代的芝加哥学派。<sup>1</sup>这里之所以提到芝加哥学派至少有两点原因，首先是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其次是他与中国社会学发轫初期的紧密联系。对于前一个问题，略有些西方社会学史知识的人就会清楚，芝加哥大学自派克（Robert Park）在 30 年代的大力倡导之后，芝大的社会学研究蔚然成风，随后出现了一大批的著名学者。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布鲁默（Herber Blumer），常人方法论的戈夫曼（Goffman）以及直接继承了派克传统的黑金斯（Everett Hughes）等人都出身于或者是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与此同时在战后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渐渐出现了一种对派克的传统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第二代的芝加哥学派。总而言之这一派的学者是在派克的思想引导下从事着格尔兹所谓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探求，结果虽未完全达到，但却是有有一个学术的奋斗目标。借用一位伟人的话来说，他们是站在了伟人的肩上。

芝加哥学派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应该追溯到派克 1932 年秋天来中国讲学为肇始。吴文藻先生及其弟子聆听派克先生的讲座，并编成《派克社会学论集》出版。派克先生的思想简单来讲是受到了法国的孔德的实证论和德国的齐美尔的冲突社会学的影响，注重在自然的状态下观察社会中人的行为，即是要看这些社会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样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学者，特别是在费孝通先生的研究路径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当然我这里只是说在中国的社会学的发展理路中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方交融的传统，并无意要对这段历史的细节做出更多的探究。如果

<sup>1</sup> Gary Alen Fine, 1995, ed, *The Second Chicago School? The Development of a Postwar American Sociolog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